

行进中的 现代性

晚清“五四”散文论

丁晓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行进中的 现代性

晚清“五四”散文论

丁晓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丁晓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8093-8

I. ①行… II. ①丁… III. ①散文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25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19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双峰飞渡有鸿声

王兆胜

喜闻丁晓原先生新著即将付梓，在出版之前，他坚执让我作序。

“写序”愧不敢当，但作为散文爱好者和散文研究者，也作为晓原的知音，趁机说几句话，亦吾之所愿。

与晓原兄最早结识于何时，现已无从考查。但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每次见面都很愉快，也有会心之顷，而且这种感受经久弥深，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淡薄。古人常有知音之感，在我们之间，我就有这种感受。

日子匆匆而过，于是生命化结成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长留于记忆中。晓原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真纯、谦逊、善良、勤勉，以及他不断求索和超越自我的执着精神。

早在20世纪末，丁晓原就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开启了报告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之先河。随后，他又连续出版《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等，可谓著述甚丰、硕果累累。这次他又推出这本《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将其研究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行进中”包含了进取心和谦卑意，“现代性”反映了与时代话语相贴近的理性清醒，“晚清”和“五四”又是两个难以攀登的高峰，“散文论”从报告文学转向散文研究，视域更加扩大了，目标也更高远了。也可以这样说，作者选取了一个极富挑战性也是颇有价值的选题，从中可见其思想品质和精神高标。

2 行进中的现代性

在所有文类中，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是最薄弱的，不要说与诗歌、小说，就是与戏剧相比，其研究的滞后也不容置疑。不过，也正因为此，散文研究者的探索 and 追求才弥足珍贵，也带有某些悲壮意味。我认为，在新时期散文研究者中，丁晓原用功最勤、最为踏实，也是最具探索性、拼搏精神、创新意识的一位，随着散文研究意识的增强，其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将会不断发出耀眼的光芒。

迄今为止，散文是一个被学界严重忽略的文体，其研究价值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古代为诗国，也是文章大国，但却没人说是小说或戏曲之国。诗歌无疑是中国人的灵魂，古今历代名家名作层出不穷、经久不息；而文章则是经国之大业，须臾不能离开。第二，现当代中国新小说、诗歌、戏剧当然可以研究，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渐渐剥离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逐渐遗失。试想，如果将西方文化包括后现代因素抽离，所谓的“先锋文学”还能留下什么？西方现代的东西没了，中国传统的基因与密码丢了，于是它们就会成为无根的飘浮起来的文学。因此，如果将来要在新文学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我们不能指望现代诗歌和小说等文体，恐怕要回到现代散文这个一向不为人重的所谓的“落伍”文体。第三，散文是一个有太多受众的文体，散文研究的兴盛是早晚的事。第四，散文“易写而难工”，其研究更是如此。散文就如同水一样难以描述，更难用一种既成的理论进行规范和解释。当然，这为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用理论思辨还要用心灵去感悟，除了进行规范还要随地赋形，除了注重实写还要考虑到虚构。散文研究仿佛需要太极功夫，在看似固定的方圆、进退、呼吸动作中，往往更需要内化和融通，以参透阴阳之理和天地道心。

作者将“晚清”和“五四”两个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探究其间的起承转合，也考察其现代性超越意向，这本身就是一种“飞渡”。与诗歌和小说等其他文体同中有异的是，散文与中国古代文章虽有联结，有的方面还是根本性的、基因性的；但是，其断裂也是悬崖式的。这就如同郁达夫所言：中国现代散文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有鲜明的“个性”，这与中国传统文章有着本质之别。因此，从“晚清”一巅飞渡到“五四”一

端，那是多么冒险的事情，也对作者的知识储备、文化积淀、价值观念、思想力量以及审美趣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紧紧抓住“现代性”这一维度，从而在“晚清”与“五四”之断崖间拴了一条索链，从中可见传统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刀光剑影以及观念、文体之变。作者是将“晚清”作为现代性起动之点，通过各种研讨，逐渐抵达了真正的“五四”现代性彼岸。这是一次散文观念与文体现代性的长旅，其中虽不乏艰难的选择甚至困惑，但确定不移的目标让现代性追求义无反顾地前行。在此，有两点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一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识，二是文体的现代理性自觉。这是飞渡“晚清”与“五四”这两座高峰的现代性关节点。如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鲁迅杂文的评价不高，认为它远远低于其小说成就，有人甚至极尽贬低鲁迅杂文之能事。然而，本书认为，杂文是鲁迅生命意识最深沉的灌注，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充分张扬和显现，也是在接续中国先秦传统尤其是孔子品评弟子的方式后，所做出的新的创造。这样的认识和看法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只从狭义对“散文”进行理解，而不从大散文——“文章”的角度观照，简单地评说鲁迅杂文，显然不会获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对于鲁迅《野草》的看法，长期以来几成定论，它是优美的散文诗或“诗的散文”。但作者认为，《野草》是“‘诗体’的杂感”。他说：

指认《野草》是“个人杂感的诗意变体”，这是李欧梵的一种发现。在我看来，《野草》即是“诗体”的杂感。杂感写作是作为知识分子型作家的鲁迅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写作杂感表明了作者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文类的逞心而为，需要社会有一种让人自由言说的可能和写作主体拥有自主随意地思想的心灵。但是作家的知识分子化的本性与客观环境、主体心理环境之间，在鲁迅写作《野草》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鲁迅是“杂感”型作家（即思想强势型作家），即使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也是以“杂感”型为其底色的。作为作家，表达的欲求是永远的，更何况鲁迅是“杂感”型作家，但语境与心境的阻抑又不可能如《新青年》时代，使他恣意

4 行进中的现代性

地写作“随感录”。这样“杂感”变体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一种现代性烛照，作者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于突破既往结论有点石成金之妙！表面看来，对于《野草》之评价：一个是诗意，另一个是杂感；但重心有根本区别，因为“诗意”更多指向文人士子的情怀，而“杂感”表征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

当然，除了现代性的理性之思，丁晓原文本中也充盈着诗意的灵光，这使其理性之笔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也容易进入读者的心灵深处，拨动人们的心弦。如作者这样写道：

将“诗体”置于杂感之前用以指称《野草》，意指杂感的生成与形态是“诗化”的。“诗”为何物？诗无解。但诗性应是关联着主体的心灵，诗是一种最为心灵化的存在，因而也是最为个人化的。……《野草》许多篇什让我们感受到作者被压抑着而又躁动着的精神世界。表现在语言形式方面，显见的是作者好用反复的表达方式。主体的内宇宙十分丰富而复杂，痛苦而彷徨，犹豫而前行，绝望而希望，朦胧而清晰，使作品凸现了一种主体错综纷杂的精神结构。而这正是作为散文诗诗性凝结的关键之所在。

时下的文学研究多走向文化研究，缺乏文学性和审美性，所以研究往往变成了坚硬的、裸露的山石，不能像梁启超一样“笔锋常带感情”，更没有刘勰《文心雕龙》那样的天地道德文章，从而失去了山丰海富的葱郁和博大。读本书是一种享受，在平实的阐述和论证中，我们既能感受时代之意和理性之光，也不乏关于人生的哲学与心灵的低吟浅唱，还有对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感物致知。古人云：学问与人生要融会贯通。没有对于人生的彻悟，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当人生获得某种觉醒，学问才能变得通达晓畅，最后进入化境。

当然，由于本书面对的问题相当复杂，作者在飞渡“晚清”与“五四”时，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用“现代性”架起“晚清”与“五四”的天堑是必要的，但其间还应有非现代性所牵引的“桥梁”，即传统文化

因素或说人生的要义，这往往与诗歌和小说等文体的转型有所不同。期待晓原在后续的研究中，就现代散文对传统性的推衍这一课题进行开掘，这是很有意义的。

在丁晓原的名字里，“丁”字像拐杖，又是倒过来的问号，这是不是他“飞渡”双峰的一个凭借？“晓”中有“日”，更有“尧”，于是其中有了某些难得的启示。有人曾说：“太阳升起，请将蜡烛熄灭。”显然，晓原兄的人生有大光照临，所以无须“秉烛夜游”。“原”中的“厂”是“广”不出头，而“厂”内有“小”“白”，此是谦逊和明达之意。

世界了无际涯，任何智者都只有在谦卑与宁静中方能有悟。许多人生苦旅都可忽略不计，关键是不能失去追根溯源的兴趣，更不能失去飞翔的翅膀。这一宏大的声音常蕴于心，以至于他人无从知晓，只有在文字间方能化蝶成舞。这可能是我与丁晓原君有所共鸣的地方吧？

是为非序之“序”。

2015年12月3日于北京沐石斋

目 录

双峰飞渡有鸿声	王兆胜 (1)
---------------	-----------

绪论 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逻辑结构	(1)
---------------------------	-------

一 晚清与“五四”的逻辑结构	(2)
二 “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	(4)
三 启蒙:文体精神的链接	(8)
四 文化比较:精神资源的导入	(13)
五 由思想的偏至到思想与文学的合致	(15)

第一章 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	(20)
----------------------	--------

一 晚清:散文现代性的启动	(21)
二 应于时势的观念取新	(24)
三 知识分子散文与文人散文	(28)
四 批判和想象的主题类型	(32)
五 西风东渐中的异质化合	(34)
六 基于报刊的传播方式	(37)

第二章 文化选择与晚清散文主流话语	(40)
-------------------------	--------

一 “觉世”的知识分子与“时代话语”	(41)
--------------------------	--------

2 行进中的现代性

二 传统:始近而终远	(43)
三 西学:由“乡下人”到“世界人”	(46)
四 时代主题的凸显与表达	(51)
五 论说体与思想表述	(56)
六 “后桐城派”散文的形态	(59)

第三章 “五四”散文现代性的生成

(63)

一 作为“范畴”的散文现代性	(64)
二 自由精神:大胆地说话	(67)
三 主体自觉与散文个人性	(73)
四 语言自由化与美的白话文	(77)
五 现代性生成的“合力”	(79)

第四章 “五四”散文的命名与义项

(84)

一 散文“艺术性的”命题	(85)
二 “个人的”和“最自由的”	(89)

第五章 晚清“五四”媒体生态与散文现代转型

(95)

一 媒体生态与散文的基本关联	(96)
二 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	(100)
三 媒体主题预设与晚清散文政治化	(106)
四 媒体生态协力与散文文体自觉	(110)

第六章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的开新

(117)

一 “公共空间”与公共知识分子	(117)
二 散文天地:《申报》和《循环日报》	(120)
三 “觉世之文”:维新与革命	(125)
四 新文体:从冯桂芬到梁启超	(128)
五 新文体的新景观	(133)

第七章 “报章体”散文的历史方位和流程	(138)
一 “报章体”,报刊与论说	(139)
二 “报章体”,从发生到高点	(144)
三 “报章体”,从晚清到“五四”	(147)
四 主体身份·欧西因素·工具之便	(150)
第八章 《新青年》与现代散文精神	(155)
一 散文史中的《新青年》	(155)
二 新思想建设中的“人的文学”	(162)
三 自由精神与散文文体品格	(168)
第九章 《语丝》,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	(178)
一 “自由说话”与“语丝体”	(179)
二 作为以“批评为主”的周刊	(184)
三 “语丝”杂感的艺术化	(189)
四 “语丝”与现代散文的格局	(193)
第十章 《小说月报》:散文的诗意私语	(197)
一 “小说”之名下的散文园地	(198)
二 散文创作的“美文”自觉	(200)
三 自叙与自诉的话语方式	(203)
四 意象思维与散文的诗化	(209)
第十一章 语言之维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	(212)
一 汉语散文:文与言的流变	(213)
二 语言现代化与散文现代性	(216)
三 语言方式和现代散文体式	(221)
第十二章 “过渡语言”与晚清散文文体的变异	(226)
一 “白话为维新之本”	(227)

4 行进中的现代性

- 二 观念开新和写作取向重置 (230)
- 三 报章文体与报章语言 (234)

第十三章 “五四”白话与现代散文文体建构 (240)

- 一 文学革命中的语言议题 (241)
- 二 国语散文的语言优先 (244)
- 三 美文的语言构型 (249)

第十四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文体新质 (254)

- 一 “抗议”中的文体开新 (254)
- 二 “采西学”与开放视野 (259)

第十五章 王韬,近代报章政论体创始者 (264)

- 一 《循环日报》与《弢园文录外编》 (264)
- 二 基于民间立场的时务关注 (266)
- 三 世界视野·文体开放 (269)

第十六章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273)

- 一 天时与人为:现代散文的开路者 (273)
- 二 散文观演进中的“文界革命” (275)
- 三 作为“行动”的“文界革命”实践 (282)

第十七章 鲁迅与现代散文文体的建设 (289)

- 一 杂文,鲁迅生命的写作 (290)
- 二 杂文与知识分子精神 (293)
- 三 鲁迅的杂文文体自觉 (296)
- 四 “个人杂感的诗意变体” (302)
- 五 自由体《朝花夕拾》 (307)

第十八章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311)
一 偏于散文的写作心理	(312)
二 人生哲学与散文意趣	(316)
三 情感方式与言说张力	(320)
后记	(325)

绪论 晚清散文与“五四”散文的逻辑结构

以“五四”文学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又被指称为“新文学”。植根于新的社会文化生态土壤中的“五四”文学，由于创作的主体、观照的对象，文本的意蕴等与前代文学相比，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因而它具有诸多显见的“新”质，就成为一种必然了。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历史总会以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惯性，对后续的社会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历史宛如一条斩不断的脉流，其内在存有关联着的逻辑。那种由于政权的更迭或朝代的改换，机械地断裂前后历史阶段之间联系的做法，是有悖于历史自身的法则的。从历史的哲学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①这就是说，历史的后来创造是以“它的先驱传给”“作为前提”的。而就具体的文学演进的历史考察，文学史的分期有时可以与社会史的分期相对接，但有些时候人为地将两者对接，只会使文学史成为社会发展史的附庸，从而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规律及其价值。其实“文学往往受影响于政治时期而又有其自身内在的节奏与律动，以此跨出自我的步幅”。“国家的政治大事可以成为历史划界分段的依据和标志，但是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国家的政治大事件同步。”^②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704页。

② 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一 晚清与“五四”的逻辑结构

以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为例。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宣告了绵延近三百年的封建末世王朝的终结，而且也表明中国终于告别了封建社会。政治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一般的社会史将此前至1840年间的这段历史指称为近代史，而此后的历史则归属为现代史。但文学的历史却并不像社会的历史那样因为某一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在一夜之间彻底地改变了它的性质，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并没有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断裂开来，相反，“五四”文学历史地承接晚清文学，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生成自身的品质。正因为看到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有着许多逻辑联系，所以一些研究“新文学”的学者，自觉地从晚清文学中寻找新文学发生的某些因素，破除不同社会史之间的分割，将“五四”前期文学与晚清文学，主要是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前后时段的晚清文学整体性的观照研究，以还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史运行的本真图景。

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五四”散文与晚清文学（主要是晚清散文）之间内在存有的关联。统观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的散文，对其做比较分析，我们要给出晚清因素何以成为“五四”散文精神资源或直接影响“五四”散文写作的可能与事实。这并不意味着贬损“五四”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散文标志性存在的文学史意义，而是通过表达历史的真实，在凸显晚清散文的价值的同时，彰显“五四”散文的意义。“五四”散文家不仅接受着晚清文学的影响，而且也在承接中实现了超越。经他们的创造，在晚清散文中孕育的现代性元素，茁壮成长，蔚然而成一道整体的有深度的“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风景。

通常而言，“五四”新文学家们高擎科学民主的大旗，倡导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尽管他们自身的思想和创作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但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的策略，有时不可避免地有矫枉过正的运作措置。而我们观照他们对晚清文化文学的态度，可以发现不少“五四”新文学家是受了晚清的影响。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晚清的“过来人”，本身就见证、感受、参与了晚清的文化运动。鲁迅生于

1881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周氏兄弟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作为域外文学的翻译者出现在文坛的。同时，鲁迅以《文化偏至论》（1907）《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1908）等包含了“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等新的思想元素的著述，开始塑造作为“勇猛无畏”“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文化偏至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晚清时期鲁迅是接受了其时思想主流的滋育的。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中写道：“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鲁迅对于读物的选择，表明他对所读之物内蕴的价值取向的认同。鲁迅不仅自己读《清议报》《新民丛报》诸类的报文字，而且还将它们推荐给其弟周作人。这样的细节足以反映其时鲁迅的思想脉络。

1891年出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他受到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幅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胡适的自述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像胡适这样当时还是青年（少年）后来成为“五四”代表人物的精神世界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建构意义。正因为成为“五四”新文化创造主体的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他们本身曾经走过晚清并且有着浸染其时主流思潮的精神经历，所以他们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创造中，就会比较自然地表现着晚清文化的某种遗传“基因”。

晚清文学，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文学，有学者视之为后来“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根基。陈子展对他的这种立论做了分析。这种分析指向两个维度。一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戊戌“这个时候才知道要废八股，

4 行进中的现代性

文人才渐渐从八股里解放出来。固然我们也知道八股文试帖诗是为科举考试而作，不是文学；但是这种考试文体不废，于文学发展上有极大的障害”。二是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这个时候才开始接受外来的影响。中国的文学固然自有纪录以来就带有变迁，但与国外学术不大发生关系。只有魏晋以后，受到一点印度佛学的影响。到了这个时期，谭嗣同、梁启超一般人所倡的‘新文体’与‘诗界革命’，又很显然的受到外来影响，并为后来文学革命建立了一个根基”^①。戊戌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根基”，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一些可以贯通的理路。晚清时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多样性、矛盾性、复杂性呈现在作家面前；关注国运的作家感应着时代剧变的刺激，接受着西风东渐的思想洗礼。生长着的作为知识分子型的作家的主体性，召唤着他们激扬文字的言说的欲望。而这种言说的欲望，在传统的文体系统中，找不到可以匹配的载体。传统的文体无法表达或者还会阻抑作家表达反传统的异化的新思想。因此，晚清作家面临着一个文体匮乏的困境。但创造是时代所赋予这一代作家的使命，于是便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等文体创造的鼓呼与践行。正是这些“革命”部分地然而而是直接地导引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二 “文界革命”与文学革命

从散文这一文体看，晚清“文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有着显见的接近性关联。在晚清的诸文体的创造中，无疑散文的实绩是最大的，这是由散文文体本身和其时特定的时代状况所决定的。散文对于主体和客体的观照和反映具有“无中介”的直接性，它的“散文”，使作者的表达受到形式的限制相对要少一些。具有这些便利的散文，在一个文化多样杂化、言说相对自由的时代，就十分自然地会成为喜欢论评世事、表达思想的知识分子型作家首选的文体。但原有的古文体制或八股制艺的则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新的主体、新的表达需求，于是梁启超于世纪之交提

^①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